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敌内幕

1937—1945

上册

商务印书馆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 敌 内 幕
1937—1945
上 册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
陈体芳 乐刻等译 郑文华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72

内 部 发 行

中日战争时期的
通 敌 内 幕
1937—1945

(上、下册)

[美] 约翰·亨特·博伊尔著
陈体芳 乐刻等译 郑文华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7 1/8 印张 345 千字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26 定价: 1.6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于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七〇年获得富布赖特奖金的资助，到东京专门研究中日战争史。

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三百多种与中日战争有关的专著、回忆录、论文以及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前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档案材料；此外，作者还采访了当时参与日本和汪精卫勾结的日本头面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本重治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人。

这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即所谓“扩张主义派”与“反扩张主义派”之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时期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汪精卫这个卖国贼的身世、性格、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勾结。

这本书史料比较丰富，叙事也还生动。它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汪伪等汉奸集团投敌卖国的罪证，以及蒋介石假抗战、真卖国的丑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宣扬了不少反动谬误观点。例如，作者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的最后胜利，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但对石原莞尔这个

曾积极参与侵略我国东北各省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极力进行美化,还把汪精卫与法奸赖伐尔进行类比,胡说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仇恨某个外国,又怕本国左派力量日益强大,才与敌国进行“合作”的“爱国者”等等,完全是反动逻辑,为卖国辩护。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我们翻译出版时,将原书后面的注释分别放在各章之后,将参考书目仍放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陈体芳、乐刻两同志担任,汪世清、刘欣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全书由郑文华同志校订。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一定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5
第二章 汪、蒋和日本的威胁	23
第三章 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62
第四章 一桩事变发展成一场战争： 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85
第五章 在华北的合作	115
第六章 华中	150
第七章 内蒙古	170
第八章 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方案 ——一九三八年——	183
第九章 低调俱乐部	231
第十章 重光堂会议	270
第十一章 河内时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 一九三九年四月——	287
第十二章 讨论合作的条件——一九三九年四月至 九月——	331
第十三章 “从地下到天上的一切”	355
第十四章 “为蒋留下的一席盛宴”	384
第十五章 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至 一九四五年——	422
第十六章 估价	464
参考资料说明	503
附：参考书目一览表	512

序 言

一九七一年，巴黎首映了一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影片《忧愁与怜悯》，它使三十年来关于“抵抗”的那些战时传说都开始站不住脚了。这部影片认为，“合作”乃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远远不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胆小如鼠的维希官员和一小撮不爱祖国的妇女里通纳粹国防军的例外现象。它还认为，要是在一九四〇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那末法国人民就很可能举国一致地投票赞成贝当同德国侵略者达成全面停战的协定。《忧愁与怜悯》这部影片表明：尽管戴高乐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些神话，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时，法国同情贝当分子的人们才开始有所转变。《世界报》的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该影片时写道：“只是从那以后，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合作’原来是桩大大上当的交易，在这桩交易中，他们的德国‘伙伴们’根本不按什么规则办事，而只是一味勒索，‘把你的表交给我，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点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倒并没有被这类问题和疑团搞得如此混乱。不论是在大陆中国或在台湾，肯定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忧愁与怜悯》这样的影片，而且看来大概日后也不会有。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巨变把这一切都吞没了，而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全神贯注着这场巨变。不过，人们偶尔

也能听到这种议论：大家对中国的贝当——汪精卫——搞合作这个一度曾是重要的争论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日本占领中国所造成的窘困局面仍然历历在目，怎能事隔一夜就会被人们遗忘呢？最近举行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特别使我形成了这个论点。在会议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评论一篇有关汪精卫的论文时首先就提到：今天，只要提一提汪精卫的事就足以把他那个本来是平静而又和睦的家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使他们互相之间好几个星期拉长了脸，彼此连话都不讲。

viii 提出有关战时合作这一有争论的问题的是日本人（至少是学术界这个阶层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在探索以下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一部分？或许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许多国家对于它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形象都是很关切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少有几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被迫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日本的学者和为报刊撰写文章的作家们一直在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着反复的评论：中日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以及一度甚嚣尘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等。

不单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通过重温中日之间八年战争的历史而得到教益。随着我们美国自己的亚洲战争进入了第八年（反正从东京湾事件开始算起已是第八年了），我们肯定也可以从多年前的那次战争，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古典军事家孙子“持战以久，无国获利”这句名言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些在中日战争中走合作道路的人，满可以把孙子的这一警句作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座右铭。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协助我为写本书做准备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特别要向《日本翻译家》杂志的主编嘉纳勉表示谢意，因为本书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当我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间在该杂志担任工作时进行的。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在这方面帮助我，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列举他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要是每个写有关日本的书的作者都有嘉纳勉先生这样的朋友，那他就太幸运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角田顺博士为我安排了许多次访问，而且他对日本现代史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

那些接受我访问的先生们，对于本书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张嘉璈、陈春辉、金雄白、今井武夫、高宗武、李圣五、J.I. 陆、松方吉三郎、松本重治、冈田洋次、清水董三（我悲痛地获悉他已于一九七〇年去世）、陶希圣、牛场友彦、和山崎重三郎等。我要感谢何炳贤先生，他不仅接见了我，还主动地为我同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进行初次会见作了安排，为我提供了照片，通过信函回答了我大量的问题，并且当我们在香港逗留期间招待了我和我的全家。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的殷勤款待。我还要感谢曾仲鸣^{ix}夫人，她接见了我的妻子，并慷慨地送了我本书所用的许多照片。我想对上述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说句话：当他（她）们读到那些回忆起来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本书将不辜负他（她）们对我的信任。

我还要对曾审阅和评论我的论文（它是本书的前身）的教授们表示感谢：托马斯·史密斯、莱曼·范斯莱克和克劳德·巴斯。对许多曾经慷慨地支持和鼓励过我的朋

友们来说,我现在才表达谢意既是为时太晚,而且也是很不够的,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肯·巴特勒和约翰·巴尼特——我应该单独表示感谢。对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作,我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戴维·曾和阿伦·保罗两位,在使我熟悉该馆的藏书和资料方面特别关心我、帮助我。感谢马场章、会泽正治、高姆包扎布·汗金和亨里埃塔·罗等诸位所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富布赖特委员会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

如果要把我对我妻子巴巴拉·希普勒·博伊尔的协助都一一列举出来的话,那一定会使承印本书的人负担过重。尽管这样,在结束我对大家的致谢之前我不能不对她的耐心、体谅和信心表示感谢。要是她在以上任何一方面不全力支持我的话,这本书也许根本就写不出来。

约·亨·博伊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奇柯城

1972年3月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对于西义显、董道宁、高宗武、伊藤芳男、松本重治、犬养 1 健、堀场一雄、石原莞尔等人，西方研究亚洲史的学者们一定会说，这些人所共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的默默无闻。一般标准教科书在概述现代东亚史时，对上面这些人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①但是，著名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的编者角田顺却坚持认为，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信仰对于了解中日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角田写道：“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了解这次战争的关键”。^②在谈到上述的那些日本人物时，角田认为，只有他们几个日本人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几年中提出过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建设性计划。他把他们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在大陆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既危险又徒劳的认识，同官方的政策作了对比。他用了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来描述官方的政策：肤浅的、矛盾的、空洞的和盲目的等等。

在这批人物中，堀场和石原是军事战略家。由于他们考虑到和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到如何努力使日本的军事建设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应付对苏战争的到来。他们对于必须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想得很多，并在冲突发生之后，便主张争取尽快结束冲突，最好是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使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受到最低限度的

损耗。但是他们的观点逐渐失势，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两个人都被解除了在东京“中央”^{*}制订战略计划的职务。

- 2 这批人物的其他人中，既有次官一级的官僚，又有企业家和一个新闻记者。他们自己组成关心及早结束战争的人士的“第三种力量”。这批人物以进行私下的和平努力开始，最后导致了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离重庆这件大事；又从汪精卫叛离重庆开始，直到十五个月以后在南京建立了汪所领导的合作政府而告终。随着建立汪政权的过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以石原和堀场为一方向以第三种力量集团为另一方之间个人的、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紧密联系。

石原坚信，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对第三种力量集团很有吸引力，但对石原的陆军同僚们来说则很讨厌。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可是石原没有能够在中央呆下去，他的想法和第三种力量的想法也都没有占上风。这种结局——即“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具体体现就是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一大批傀儡政权。本书接受了角田的建议，认为研究这批人物的观点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就

^{*} 中央是一个含意不清楚的词汇，指的是由几个东京文武大臣组成的小团体。它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大臣组成，但一般说来，它的成员包括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有时也包括一些次一级的官员，如参谋次长和军务局长。

是研究合作的政治，乃是一种可以说明东亚史中中日战争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时期的好方式。

在第二章，我对汪精卫的早期生涯作了概述。不管是接受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总之，汪的动机同那些批评汪精卫的人一样，既有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也有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在第二章，³我们考察的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情况，这时上述的某些不同动机已经有所暴露，首先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其次表现在中日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爱憎关系中。

第三、四章里，在讨论各个傀儡政权之前，我首先试图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军界和政界内部的激烈争论，使对傀儡政权的讨论能在一个视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牵涉到日本用什么方法和条件来结束所谓支那事变*的问题。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究竟日本是否应当设法解决支那事变，究竟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作出安排，还是依靠她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来确定她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的性质。

*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内阁命令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

第一种选择明显地意味着放弃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边区各省费了大劲才取得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特权和权力。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自我克制作为走向现实主义地调整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此外,这种做法对那些强调苏联构成危险威胁的纯战略家们也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旦同苏联这个敌国发生了战争——在他们的战略估计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或至少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也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那些主张和解政策的力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不管这种政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得不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华北和满洲建立帝国而得势的那股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既促使又利用中国的不统一,他们日益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踌躇满志,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北亚“称霸”,都是他们的功劳,而日本的外交家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于是,战争就为这些军国主义者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去建立会分裂中国但却能保证日本在华北的霸权的傀儡政权。在东京争论了几个月后,首相近卫文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宣布

4 日本决定停止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接触,于是分裂中国的提倡者乃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近卫宣称,日本期望一个新的中国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日本将同这个政权讨论调整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鼓吹分裂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等待官方批准他们

的纲领,在开战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建立地方傀儡政权了。在内蒙古建立了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政权,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些政权才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十二月,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关心这件事。稍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华中派遣军又建立了另一个以华中为基地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外,在某些重要城市建立了不属上述任何政府管辖的市政府。

第五章到第七章介绍各种傀儡机构的起源、特点、人选以及它们和日本陆军中支持它们的有关单位的关系。从参加这些政权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来细心研究这些政权,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动向的丰富资料。不过,我研究这些成立较早且较次要的傀儡政权的主要原因是:(1)把它们和汪精卫政权——日本傀儡制造者的最后产品——相比较;(2)考查这些地方政权之较先成立对尔后汪政权建立的影响;(3)说明这些政府是怎样去实现日本陆军领导部门中某些重要人物的设想,而这些人物是热衷于有个分裂的、顺从的中国的。

我在第八章考查了近卫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宣言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之后,在其余的几章里又转过来讨论汪精卫政权。从最初公开暗示要成立傀儡中央政府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之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用不着去详细叙述这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最后几章的主题:中日双方对新政权的目的和性质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中国方面原来设想汪政权会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府,在华南未被

占领的几个省行使政权并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方面的误解、估计错误和很多奸诈行为，最后出笼的汪政权却很不一样。经过汪和日本人之间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建立在中国被占领区的汪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基本条约，把汪政府从属于日本的关系明确地肯定了下来。

在这两年中，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甚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汪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或甚至日本陆军的全力支持。例如，陆军内部各派系，就象对待其他各种政策那样，对于同汪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希望和各地方傀儡政权保持现存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以象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首的新政权。还有一些人对与汪打交道是否明智抱有很大的怀疑，感到任何最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必须和蒋介石商谈。的确，甚至在最热心支持汪的日本人中，对于汪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前后一致和统一的看法：究竟应该把汪本人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还是只把他当作通向重庆的“桥梁”呢？关于对汪的态度背后的不肯定和变动等因素，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当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处理。

在本书中不时可以看到汪精卫的带有阴影的经历。虽然在民国初年的多数年头里，汪广泛地受到尊敬，而且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他的实权越来越小，因而从未掌握过中国的命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

好处的。汪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就缺乏军事实力派方面的支持,这时,随着整个中国都热衷于抵抗的精神,他发现他自己越发得不到政界和公众的支持了。于是,许多人就会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伟大的爱国者如何会变成傀儡这一矛盾现象。有些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③

这种争论——或曰指责——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本书必须予以解决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说,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对敌合作者包括的类型是如此繁多,从吉斯林卖国贼直到苏加诺:吉斯林的叛逆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以致他的名字象犹太一样,在人们的语言中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但苏加诺却能自由自在地吹嘘他自己同日本人的合作。

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傀儡一词有多大用处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互相交错和互相依存已成为每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只有虚构的国际法才会认为完全的独立是有道理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④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它们证明,野蛮的征服者不可避免